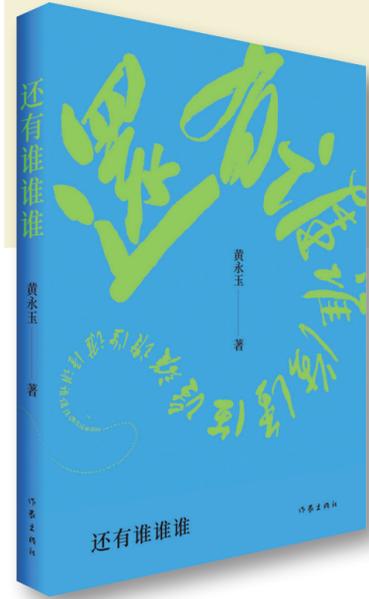


黄永玉《还有谁谁谁》:时光长河中的诚挚道白

□ 施展



2023年6月10日,“人·黄永玉百岁版画艺术展”亮相厦门,这是黄永玉百岁艺术展继在金陵美术馆启幕以来的第二次亮相。按照中国传统,时年99岁的黄永玉,已是百岁高寿的年纪。百年回首,他始终难以忘怀自己最倾心的行当——文学。临近百岁生日,黄永玉似是有意不吝木刻书画美于前,要以集结新书的方式,将《比我老的老头》的精彩故事继续讲下去,再次记述历史烟云中的故人与心事。

黄永玉的《还有谁谁谁》,是一部追忆老友、怀想人生的散文随笔集。自《比我老的老头》之后,往事已自纷散,故事仍在继续。作为流浪中国与环游世界的行旅者,这位“最老的老头”同样在时光旅程中成为了文学天地的远行人。待他跨越千山万水,蓦然回首之际,关于往昔岁月的回忆,绵延近一个世纪之久,依然此起彼伏、回旋不尽、余味无穷。

最后一个讲故事的人

世人眼中,黄永玉一直是个天然、有趣、好玩的人。除了名扬天下的艺术成就,他身上还伴随着数不胜数的人设标签,诸如“文坛奇才”“一代鬼才”“艺坛全才”“有趣好玩”“潇洒率真”“不老顽童”“最酷的90后”“好玩的人”等等。黄永玉凭借《太阳下的风景》《比我老的老头》《无愁河的浪荡汉子》《见笑集》等作品享誉中国文坛,更因其丰富多彩的传奇经历、幽默率真的人格魅力,广受社会各界欢迎,以致各大网媒平台一度盛行起“做人要像黄永玉”“老了就做黄永玉”等人生格言。

然而,生于1924年的黄永玉,他的百岁人生,可谓是亲眼见证了历史变幻的磨难和血泪,亲身经历了人间故事的苦辣与悲欢。其人、其事、其经历,必然是一本厚重非凡的大书,而它的每一笔、每一段、每一页,未必如同我们看到的“晚近章节”一样精彩。

自幼年起,黄永玉不断辗转于中国各地,在颠沛流离的动荡生活中,他一面咬牙坚守内心钟爱的艺术事业,一面潜心体悟江湖生活的苦辣心酸。可以说,正是这一段早年间“闯江湖”的流浪

经历,让这位从小向往侠客人生的湘西汉子,熏陶出一股善与人交、重情重义的江湖气质:“待朋友赤诚,见长辈谦卑,和三教九流交朋友,佩服有本事,敬畏有学问的,搭救落难的……”

诚然,“好友”“回忆”“故人”一直是他文学写作的重要母题和灵感源泉。从回顾来时路、叹之复咏之的《太阳下的风景》,到《比我老的老头》中的有趣为人、赤子之心和游离命运,再到《无愁河的浪荡汉子》洋洋百万言述之不尽的传奇人生,黄永玉一再讲述着记忆当中的故人故事。如今,时移事往,老友故去,他不禁在《只此一家王世襄》文末,袒露出写作本书的缘由:“我坐在桌子边写这篇回忆,心里头没感觉话语已经说透。多少老朋友的影子从眼前走过,走在最后的一个是。”

对一位老者,回忆二字未尝不是一种难言的幸福,又未尝不是一种难言的痛苦。

意蕴深远的文学证词

夜晚降临,万荷塘万籁俱静,太阳城孤灯一盏。黄永玉独对书桌,在回忆中清点着一个个熟悉无比的名字,一场场接连翻涌的往事,一桩桩萦绕不去的心事,恍然惊觉:“一切都行将过去或早已过去。”老友的身影纷纷离去,过去的记忆扑面而来。时移事往,斯人安在?还有谁谁谁?作为最后一个讲故事的人,他决定把所有的故事,化作一段段生命的文字。

直面时光浪潮的冲激流淌,黄永玉信笔而起,行止随心,书写出13篇求淡求精的随笔文章。书中人物,既有来自五湖四海的好友宾朋,亦不乏中国文坛的大家名士,更有烟火生活的普通百姓。在朴素诚恳的叙述中,黄永玉为数位友人绘影形声,追怀彼此间携手共度的岁月秘密,或纪事,或怀人,或追思,或纪念,一系列文字正是短篇速写和人物素描的综合,不由人不拍案叫绝。

翻开书卷,黄永玉再次带领我们见识了多位人生故交。童年时期的拜门拳师朱国富,写书烟葱、研究古董的王世襄,一生未曾走出东北森林的伐木人老龚头……数十个可合可分的故事之间,铺满了三叠四的绵密细节,夹掺了作者对人与历史的感想,或嬉笑,或讽刺,或感慨,或忧愁。人物、笔墨与情志互为表里,每每无声胜有声,常予人掩卷深思的余韵。

某种意义上,本书显然是黄永玉向《比我老的老头》的致意之作。相较于之前提笔时千万记忆的熙来攘往,黄永玉的本次写作,可谓是搜尽了生命长卷的每一方册页,沉潜于广袤深邃的记忆之乡,经由日久天长的酝酿,重新拼凑前尘旧梦的往来聚散,方才镌刻下心目中一道道萦绕不去的人物风景。

从一生仅见过三次的文学家郑振铎,到终日朝夕相伴、抗战时期痛失亲人却依然顽强生活的保姆曹玉茹,再到记忆中交游往来的张学铭、朱启钤、王道源、唐生明等数位先生……一路走来,

黄永玉眼观自我和他人的生命历程,体味复杂人生的难言况味,思索“人如何大于苦难”的方法。前尘往事,转瞬云烟,他又将一切过往记录在流动不居的文字中,以此为笔底苍生的生命之路留下了意蕴深远的文学证词。

说不透的许多话

人生长河里,时光使人理解人生和命运。年龄的增长阅历与智慧的同时,也带来了沉郁和凝重的生命思考。多年前,沈从文写下一段话:“我老不安定,因为我常常需记起那些过去的事情……有些过去的事情永远咬着我的心,我说出来,你们却以为是个故事。没有人能够了解一个人生活里被这上百种故事压住时,他用的是一种如何心情过日子。”多年后,黄永玉沿着表叔的话,如是自况:“活得这么老,常常为这些回忆所苦。”

每一个生命中无言以对的时刻,无异于宣示:故事里面还有故事。黄永玉一生勤奋,沉浸文学多年,创作体量庞大,半自传式长篇小说《无愁河的浪荡汉子》《朱雀城》《八年》《走读》洋洋洒洒百万言,不啻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道奇观。但是,黄永玉的文学世界,总有数个主题贯穿其间:人、经历与回忆。置身于科技发达的现代社

会,其手工制作本身就表现出一种姿态。黄永玉回顾江湖老友,亲手耕记忆天地,想来必是深有感触。诚然,过去的日子未必完全美丽,沿着斑驳曲折的回忆痕迹,黄永玉笑称攒下了不少“感情的淤泥”,但他在本书中秉笔记忆心事、白描世路人情,却是出人意表的简洁平白。极为轻松的文风中,反而寄托出他不能已于言的感慨,更点化了文字下的沉重思索。质言之,黄永玉正是在世间的美好与丑恶、人生的幸福和苦难中,建立起一种为生命立传的文学自觉。

在《还有谁谁谁》中,作者由与好友王逊、常任侠在动荡年代的特殊交往,生发出沉痛的历史怅惘:“难以想象的将来,不知又要花多少力气来掩盖,来洗刷这些无知的历史污迹”(《轻舟怎过万重山?》);作者从潘际桐、邹黎媪夫妻数十年的交情起笔,一路感慨至“我们这帮人在没有牢狱的牢狱里,和世界隔离太久,你难以想象,世界在微微起着变化”(《让这段回忆抚慰我一切的忧伤》);甚或是韩美林为荆州故乡人设计关公像一事,都会让他感怀起艺术家的感伤命运:“雕塑家也会老,也会受伤。以后你哪里找去?”(《梦边》)……

在他看来,说不透的话、说不完的话、还没说的话,还有许许多多。

人大于苦,也大于文章

黄永玉98岁时,接受了《人物》杂志采访。《人只要笑,就没有输》结尾写到:“黄永玉是一个真正意义上‘笑到最后’的人,他的人生或许是一种提醒:不管你遇到了什么,只要活下去,眼前经

历的一切困顿、绝望、无可扭转的败局,都会在活到99岁的时候变成笑话。人只要笑,就没有输。黄永玉的存在证明了一项不会磨灭的人性真理——人生苦,但人大于苦。”

近一个世纪的人生中,黄永玉经历了历史的动荡和波澜,品味了人世间的哀愁与悲痛。他将磨难当作笑料,把苦痛转成滋养,成就了一个“笑到最后”的人。但是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,岂止“无愁”而已?这份念念不忘“爱、怜悯和感恩”的百岁赤子,何尝不曾动情于芸芸众生、人之为人的艰难困顿?

人大于苦,人也大于文章。因其如此,黄永玉将宽阔的温柔目光望向一同行经岁月长河的历史中人,轻声讲述起一则则时光故事,为一位位普通百姓的喜悦哀乐树碑立传,倾注满含诚挚的泪水与敬意。

在《你家阿姨笑过吗?》一文中,黄永玉讲述了一家八口居住在北京中央美院宿舍时,聘请的保姆阿姨曹玉茹的故事。她的人生经历不亚于一部中国抗日战争的血泪史,任游击队长的丈夫为国捐躯,两位儿子被凶残日军抛至河中。“曹阿姨当时回娘家,返家后一个人在潮白河边坐了三天……”她前半生的坎坷命运和血泪离恨,不难令人想起鲁迅《祝福》中的祥林嫂。然而生命中真正的苦难,绝不需“讲故事”的装饰。曹阿姨痛定思痛,入城务工,自学缝纫,平日照顾小孩,闲时缝补衣裳,欢喜得女主人梅溪直赞她是一个家里的“陀螺仪”,发挥着在汪洋大海上稳定轮船的重要作用。

有好事客人问:“你们家这个曹阿姨,怎么不见笑容?”黄永玉厉声作答:“你要是清楚她上半辈子的事,你都笑不出来!”适逢读者百感交集之时,作者却笔锋一转,继续说:“她懂得人生,她也笑,她笑得不够薄。她有幽默的根底……值得笑的笑。”她身上勤奋踏实、平实真诚的人生态度,既得到了黄家人的敬重,更铺垫出后半生的幸福生活。

《“舍”“得”》讲的是黄永玉1954年遇见森林伐木人老龚头的故事。老龚头凭借一生积累的森林生存经验,积累了丰富的狩猎知识,某天清晨他叫醒黄永玉,两人穿越森林,急急找寻捕兽夹的收获。没想到的是猎物早已不翼而飞,偌大的铁架子上仅留下一只血淋淋的豹爪。

返程途中,大家谈兴未减。有人思索:“那些被夹着死去的豺、狼、虎、熊,一是不懂得活的意义,一是不懂得活的方法,一是怕疼,不咬掉爪子。”有人慨叹:“咬掉爪子还能不痛?不单痛,还要在以后的以后忘了它,过崭新的日子。”纵是山野间的凶悍猛兽,尚且知晓生命可贵的求生道理。这只三脚豹,硬是熬过了自断其肢的伤痛,最终在身涉险境的隐秘时刻,开辟了柳暗花明的生命转折。

无论是北京生活中绵长悠远的琐细回忆,还是东北森林里无人知晓的隐秘传奇,在他笔下,中国百姓绝非随波逐流之辈。人的生活绝非只是一味承受苦难,徘徊在哀痛和忧愁的边缘,生命

本身就有一种超越世俗悲怆的智慧和勇敢。这些故事,往往平淡处最为扣人心弦。

是的,黄永玉的人生与文字昭示我们:人不仅大于苦,也大于文章。

难道只是我我我?

黄永玉不仅亲历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,活过了一个世纪的文学历程,还因其独特的文学风格而自成一家。多年以来,黄永玉汪洋恣肆的艺术才情和快意潇洒的文学品质,赢得了一代代不同年纪的读者。可是,纵使文章惊海内,谁又能真正解读他文字背后的孤独呢?

黄永玉在《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》2022年新版的后记中说道:“有三个人,文学上和我有关系,沈从文表叔,萧乾三哥,汪曾祺老兄……我开始写书了,怎么三位都离开人间了呢?文学上我失掉三位最顺气的指导者。如果眼前三位都还活着,我的文学生涯就不会那么像一个流落尘世,无人有胆认领的百岁孤儿了。”

文字有意,光阴无情。2021年9月14日,74岁的萧铁柱(萧乾之子)病逝于希腊雅典。黄永玉在2023年方才得知,以《迟到的眼泪》作为喟叹的纪念:“唉,唉,铁柱你怎么一七七十多了。”——无限悲痛,尽在不言之中。

此情此景,恰好呼应了黄永玉《还有谁谁谁》序言的自述:“出这本书之后到一百岁我还要开个画展,起码还要忙三四张画。大概,大概就没时间再写文章了……”

百岁光阴磨洗的文字,平白简易,如诗如歌,貌似轻松随意的文风笔意,反而更能点染文章内外的微言大义。从钢笔到画笔,从稿纸到铅字,过去心里默写和记诵的姓名,今朝终于化作纸上的生命即景,但文集的命名——《还有谁谁谁》像一声欲言又止的喟叹,深意宛在其中,故事的主人公悠然远去,捧卷的读者又是何人?作为走在最后的人,黄永玉记下了人与时光的故事,读者也是作者自己。谁还知晓笔墨酣畅时的几许深意?何人能解浩茫心事间的一点灵犀?

这一场“还有谁谁谁”的问答游戏中,谜底似乎就在谜面:只是我我我。

俗世光阴,辗转不休,黄永玉依然以一种沉稳、坚韧、优雅的姿态,摩挲无垠的时光和无言的老境。虽然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人世沧桑、何以寄的孤独,但他高迈的眼光、赤诚的情怀始终如一,执意要把人木三分的坎坷心事,沉淀至人与时光的层次上,在时光牵引中实现感情的契合与共鸣。他的写作,正是要为过往的人与生命留下自己的文学见证。

尽管风云际会的时代早已远去,哪怕多少故人的身影盘桓依然,黄永玉仍决意持作者之笔,继续把故事讲下去,誓要让文字见证人与生命的尊严,以文学抵抗消逝、沉默和遗忘。这一渺不可得的希冀,无限深情的选择,不止有斯人已去、何日再来的伤逝,更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。(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)

■书摘

幼学纪事

□ 于是之

的土地上,立刻就化为乌有。他奔波一世,却仿佛从未存活过人间。

说也怪,人过中年,阅人遇事也算不少了,但对老郝叔,我老是不能忘记,总觉得再能为他做些什么才可以安心似的。

二

现在可以说些有关读书的事了。

一个人的读书习惯,依我看,总是靠熏陶渐染逐步养成的。压、逼、打、骂,都无济于事。这就需要有一个稍微好些的文化环境。我的家庭和所住的杂院,自然教给我许多学校里学不到的知识,但就培养读书习惯而言,那不能说是好的环境。我正经上学只念到初中,且功课不好。虽然读了《苦儿努力记》,也没收到立竿见影的效验。一题稍微繁难的算术作业,我懵住了,能找谁去?杂院里是没有这样师资的。我以后所以还喜欢读点书,全靠我幸运地遇到了许多良师益友。有的在校内、在课堂上,更多的是在校外和课外,在日常的生活中。

三

开始叫我接近了文艺的是孔德小学的老师。

孔德小学,在我的记忆里是一所办得很好的学校。设备齐全,学费却低。老师们也都像是很有学问的人。比方有一次,一位眼睛近视得厉害害而不戴眼镜的老师,把我们几个同学招呼到他的宿舍里去,给我们诵读《罪恶的黑手》。他屋里哪儿都是书,光线显得很暗,所以他需要把诗集贴近鼻尖才能读得出。他的读法,也与时下的不同,不洪亮,无手势。虽然书挡住了他的脸,但从夹缝里看过去,还是可以看见他脸上的肌肉都是很安静的。他的这种读法,听上去,比听现在的某些朗诵受用,孩子们都被他吸引了,打动了。长大以后,虽然我再没去读这首诗,然而当时听着他所留下的印象,却始终记得。这位老师不久就不见了。当时,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兴致叫几个孩子去听这首诗呢?我至今也不明白。每当路过孔德旧址,我还常常想起他来,我总觉得他或者是一位诗人,或者是一位革命者,老幻想总有一天会碰上他。虽然我依旧不知道他的名字。

但是有一位美术老师我却记得清楚。他是卫天霖先生。这当然是一位大画家,可那时我却全然不懂他的价值,竟因他出过天花,脸上留下了痕迹,背地里称呼先生为“卫麻子”。足见“师道尊严”是破不得的,不“破”尚且如此,何况号召“大破”呢!

孔德学校有一间美术教室,小学部、中学部共用,无论大小学生一律要站在画架子上前美术



课。先是铅笔画,铅笔要六个“B”的,还要带上橡皮。“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”,这当然是要准备的。可是小学生也要学用炭条作画,炭条消耗大,向家里要钱时,已从大人的脸上窥出几分难色;待知道了擦炭笔画不能用橡皮而必须是烤过的面包时,我便不再敢回家去说了。忘记了是我个人没学着炭笔画,还是卫先生更换了教法,反正是这个阶段不长,后来就交了水彩画——不管我是否买得起炭条和面包,但卫先生这种在一两年内,多种画法都叫孩子们尝试一遍的做法,我是拥护的。孩子们的求知欲是极强的,精力是非常饱满的,那是压抑不了的。当批评孩子“好高骛远”时,至今仍仍觉得要慎重些。二十几岁有大成就,我以为完全符合人的智力发展,是很正常的事。相反,四十多岁的人,还被称为年轻艺术家、年轻学者、年轻教授,倒是不大正常而且令人痛心了。

卫先生还有一种教法,我们当时也很喜欢。

美术教室里,有许多石膏坭塔:圆球形、正方形……他没有叫我们画这些,开始就是静物写生,画小瓶小罐之类。过了一阵以后,又叫我们到户外去,先画校园里头,后来就去东华门外的筒子河。孩子们对跑出去画画快活无比。我们画,卫先生跟着看,他也好像很高兴。一次写生,我画的地方前边是许多树,后边是一排矮松,再往后则是满墙的爬山虎。当时只知道看见的都要画上,哪里懂虚、实、疏、密这许多深奥的道理!结果,我画的画面上是绿树、绿蔓、绿叶、绿茎,简直绿得不可开交,一塌糊涂了。谁知这时候卫先生正站在我身后看。我扭头看见他,笑了;他看着我画的那幅绿色作品,也笑了,而且还称赞了我。到底是称赞我的什么呢?是有几处画得好?还是勇气可嘉,什么都敢画?或者根本就不是称赞,只是一种对于失败者的无可奈何的安慰——当时我可不想这么多,反正是被老师夸了,就觉得了不起,就要画。

此后,我画画的兴趣越来越浓,差不多延续到上初中一年级的時候。

对于卫天霖先生,我并不是为写这篇文章才想起他的来。时间还要早十来年。那时,首都剧场附近有一阵颇贴了一些所谓“揭露”卫先生“罪状”的印刷品。大家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里,都学会了一种本事,就是能够在通篇辱骂的文字里看出一个人的真价值来。我也正是从那些印刷品里才知道,原来第一个引导我接近艺术的竟是这样一位大人物,我不禁骄傲了。

前两年,美术馆举办了先生的画展,我去看了。我在先生的自画像前,伫立了许久。他并没有把自己画得如何地色彩斑斓,还是他教我们时的那样的平凡。我不知道美术界对他是怎样评价,我只觉得他曾是一位默默的播种者。他曾在孩子们的心田里播下过美的种子。而美育,我以为,对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是非常重要的。

(摘自《于是之全集》,于是之著,李曼宜编,作家出版社2023年7月出版)